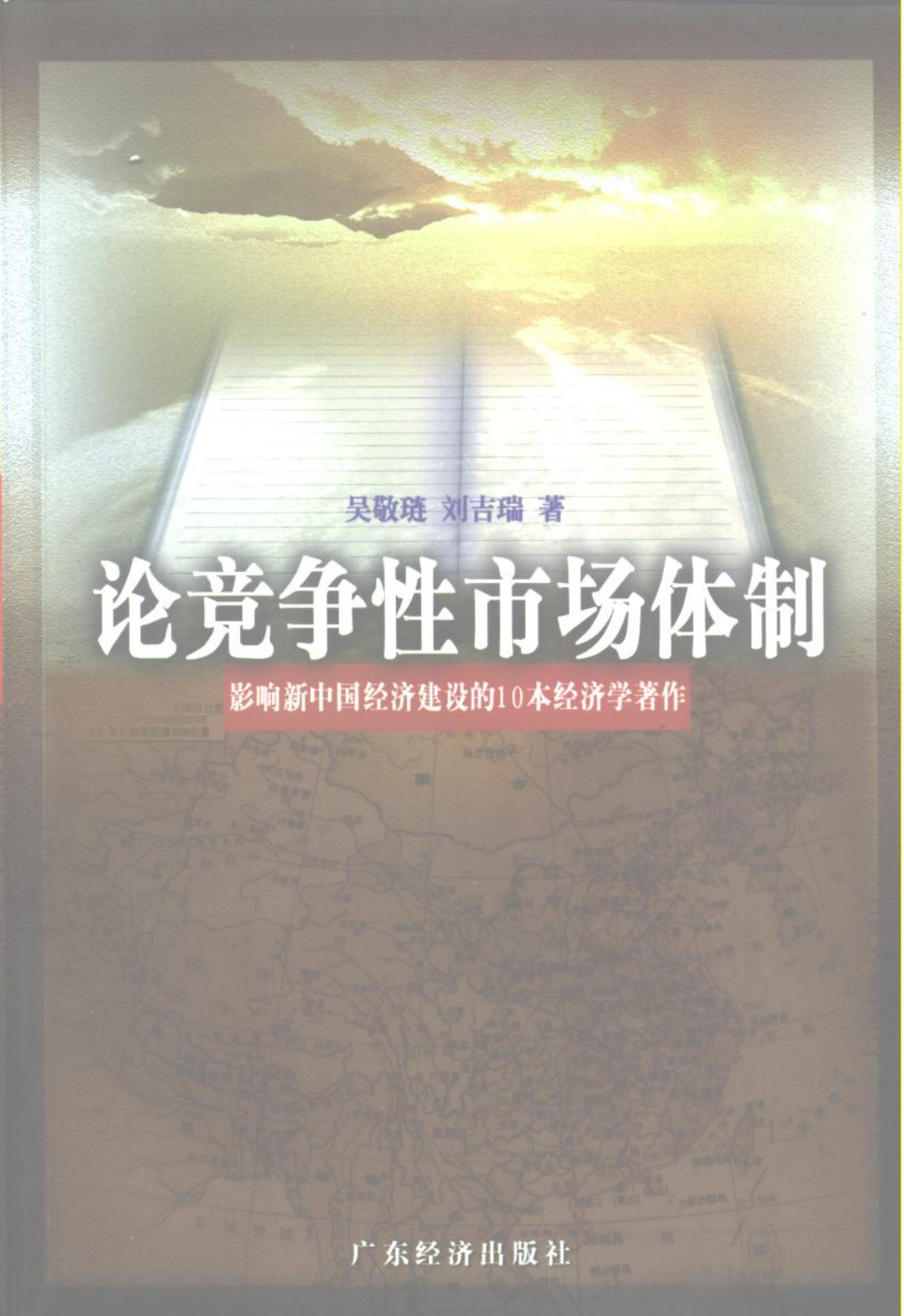




吴敬琏 刘吉瑞 著

论竞争性市场体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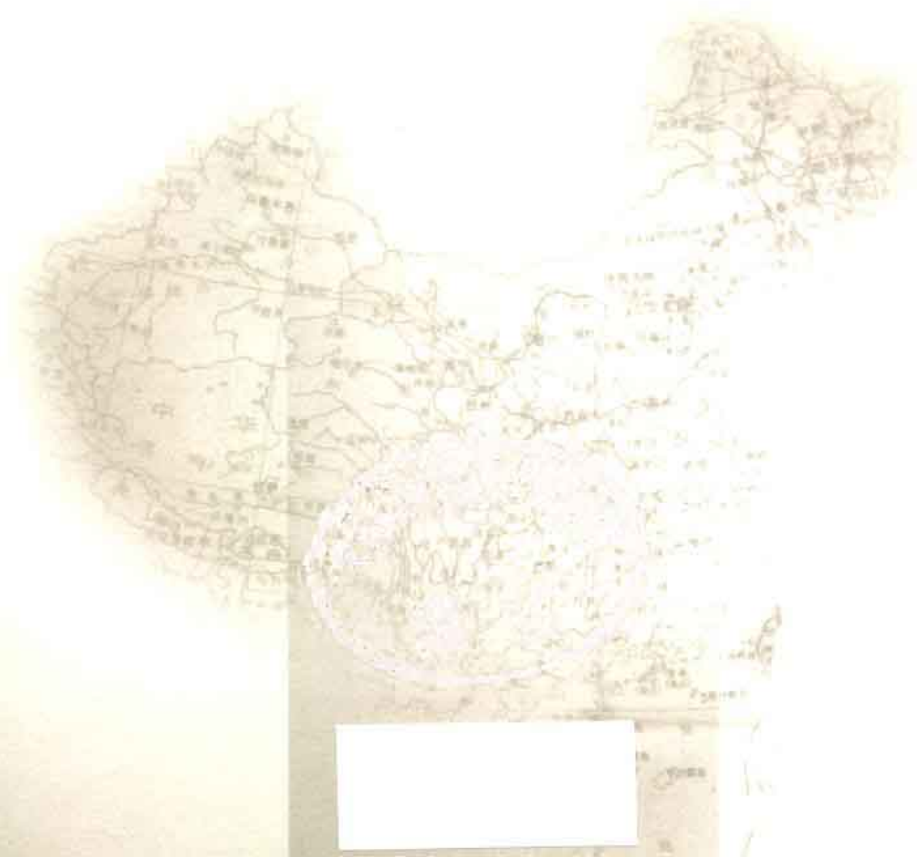
影响新中国经济建设的10本经济学著作

广东经济出版社

吴敬琏 刘吉瑞 著

论竞争性市场体制

·影响中国经济建设的10本经济学著作·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论竞争性市场体制/吴敬琏、刘吉瑞著.

—广州: 广东经济出版社, 1998.9

ISBN 7-80632-288-4

I. 论…

II. ①吴②刘…

III. ①市场竞争—体制改革②体制改革—市场竞争

IV. F045.5

影响新中国经济建设的 10 本经济学著作

论竞争性市场体制

吴敬琏、刘吉瑞 著

出版发行: 广东经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5 楼)

经 销: 广东省新华书店

印 刷: 东莞新丰印刷有限公司 (东莞市凤岗镇天堂围乡)

规 格: 889×1194 毫米 1/32 11.5 印张 2 插页 275 000 字

版 次: 1998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1999 年 7 月第 2 次

印 数: 5 001~10 000 册

标准书号: ISBN 7-80632-288-4 / F·135

定 价: 23.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读者热线: 发行部〔020〕83794694 83790316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出版说明

在新旧世纪的交叉点上，我们满怀喜悦与感慨向广大读者郑重推荐“影响新中国经济建设的10本经济学著作”丛书。

追寻新中国半个世纪风风雨雨的脚步，我们不难发现，每一个闪光的足迹，无不同中国经济学家的理论贡献紧密相连；每一段坎坷之路，同样，也都与理论的灰暗、理论的实践程度不足连在一起。正因如此，我们深感，对中国经济学家半个世纪的艰辛探索已经取得的一大批重要理论成果，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在邓小平经济理论指导下，取得的丰硕成果，初步追寻与回顾，遴选出曾对新中国经济建设发挥过重要作用，特别是今后将继续发挥重要作用的优秀经济学著作，编成丛书予以出版；这对于经济学的学科建设和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实践，其意义均是不言而喻的。以上是我们（中国社科院经济所、广东经济出版社）联合发起开展“影响新中国经济建设的10本经济学著作”论证活动，并出版此丛书的缘由。

为了将这件意义深远的工作做好，我们成立了“影响新中国经济建设的10本经济学著作”论证活动工作小

2
组，成立了以刘国光（原全国人大常委会、中国社科院特邀顾问）为主任委员，张卓元（中国社科院经济所所长）、李本钧（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为副主任委员的论证委员会，组织了全国 25 名知名学者、专家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数以千计的经济学著作，进行了历时近一年的科学、认真的论证，经过反复的遴选，最后在京召开了“影响新中国经济建设的 10 本经济学著作”论证会议，经无记名投票，郑重推荐孙冶方《社会主义经济论稿》、马寅初《新人口论》等 10 本优秀经济学著作。这些著作不仅代表了新中国各个阶段经济学发展的理论水平，更为重要的是，这些著作曾深深影响着共和国的经济建设。其中薛暮桥著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曾三次重版六次印刷，发行量达 1 000 万册，可见该书影响范围之大，程度之深，其学术意义及实践价值显然毋庸置疑。

我们认为，此次具有一定权威性、客观性、科学性的论证活动所隆重推出的“影响新中国经济建设的 10 本经济学著作”丛书，对于理论部门研究中国经济建设史、研究中国经济学说史；对于经济实践部门掌握中国经济建设规律，把握中国经济发展趋势，科学决策；对于经济类专业学生学习经济学理论，提高经济学素养，均具有重大的参考价值。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广东经济出版社
1998 年 9 月

总 序

为促进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和广东经济出版社共同发起了推荐对新中国经济建设有较大影响的 10 本经济学著作论证活动。这一活动是从思想史的角度，回顾新中国近 50 年的发展历程中，中国经济学所起过的积极作用；并把其中较有代表性的著作，推荐给广大读者。这个工作是十分有意义的，也是十分艰巨的。在成千上万本著作中，推荐 10 本书，不能不说是挂一漏万的选择。所以，这次推荐论证活动，只能叫做第一次，以后还应有第二次、第三次，逐步把多数好的经济学著作都推荐给广大读者。这个“第一次”的推荐论证活动，是由在京的许多专家反复商量，先后提出了 83 本和 52 本备选书目；并由全国 25 名专家学者组成了论证评选委员会，通过认真讨论，最后投票选出了以下 10 本经济学著作：

1. 孙冶方：《社会主义经济论稿》；
2. 马寅初：《新人口论》；
3. 薛暮桥：《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
4. 于光远：《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
5. 王亚南：《中国经济原论》（又名《中国半封建半

殖民地经济研究》);

6. 卓炯:《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

7. 蒋一苇:《论社会主义的企业模式》;

8. 刘国光:《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模式研究》;

9. 厉以宁:《非均衡的中国经济》;

10. 吴敬琏 刘吉瑞:《论竞争性市场体制》。

这 10 本著作本身体现了中国经济学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的发展,以及在改革和建设的过程中,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当然,有的著作是 80 年代以前写的,所讲的内容,似乎离我们当前体制改革的话题较远。但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不是虚无主义者,中国近 50 年的历史,是我们一步一步一个脚印走过来的。今天的经济理论,也是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这类著作虽然已不完全是今天的话题,确也不可否认她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曾起过的积极作用。同时,当人们仔细阅读这些著作以后,也会体会到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市场经济理论、改革潮流来之不易,我们更应珍惜她,发展她。

另外,由于经济理论的繁荣,好的经济学著作也数不胜数。这里所推荐的 10 本著作,她们的长处、短处,在经济思想史中的地位到底如何,也希望广大读者进行评议。

刘国光

1998 年 8 月

序

薛暮桥

《论竞争性市场体制》，是吴敬琏同志与一位青年学者以对话的形式写成的一本新著。由于我目前精力不济，要仔细读完这本书已不可能了，但我与敬琏同志长时期共事，经常在一起研讨问题，对他的观点是了解的，在许多问题上有相同的看法，因此，我完全相信，这本书的出版也会像敬琏同志的其他著作一样，对我国的经济理论研究和经济体制改革将发挥促进的作用。

1

敬琏同志是一位在理论上卓有建树的经济学家，尤其是近十多年里，他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战略和政策等方面，发表了许多独到的、并被实践验证了是正确的见解。在改革的时代潮流中，他的学识和才华得到了较好的发挥。

我是 50 年代与敬琏同志相识的，但到相互比较熟悉，经常一起探讨问题，切磋文章，则是 80 年代以来的事情。

50 年代敬琏同志还是一位刚刚跨出大学校门的青年学生，曾经参加过我与于光远同志共同召集的一次理论讨论会，在我的领导下工作过一段不长的时间。他是孙冶方同志的学生，有比较深厚的理论功底和独立思考问题的能力。不过，在当时历史条件下那种受“左”倾思想束缚的研究中，一般来说经济学工作者是

很难有所作为的。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敬璉同志和中国大多数经济学家一样，冲破“左”倾思想的束缚，极大地解放了思想，并初步显示了作为一个经济学家的社会作用。80年代初，我国经济理论界的讨论，主要集中在社会主义经济是否具有商品经济属性的问题上。当时，提出社会主义经济具有商品经济属性的观点，是要冒政治风险的。那时，我国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很大程度上受了苏联教科书的影响，一般认为在社会主义经济中不存在市场调节，更不是商品经济。所以有些经济学家指出，“社会主义不同于资本主义，就在于以计划代替市场”。这种将计划和市场当作区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标准的思想方法，在当时要改变过来是十分艰难的。为了冲破“左”倾思想的束缚，我国的经济学家作了不懈的努力。敬璉同志在这一场关系到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基础和实践方向的讨论中，作出了一个经济学家应有的贡献。

1984年夏。敬璉同志从国外研修回国，即被调到原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后与国务院的另外两个研究中心合并为现在的发展研究中心）。此后我们在一起工作的机会多了，也相知更深了。在这一时期里，他经常和我在一起讨论，还陪我去调查、会见外宾。在相当多的问题上，我们具有共同的观点。

社会主义经济是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过去我们从苏联学来在产品经济基础上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体制，几乎所有的产品都按计划生产、按计划分配、按照计划价格互相交换，只有计划管理而无市场调节。那时虽然也承认还有商品，但认为生产资料等不是商品，仅仅保持着商品的外壳（计价等等），而必须由国家来制订计划价格，不能有由价值规律决定的市场价格，结果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几乎所有的产品都明显

地背离价值；即使名义上是“自觉运用价值规律”，实际上也是抛弃价值规律，因而难免要受到客观经济规律的惩罚。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提出要解放思想，一切从实际出发，任何经济制度的取舍要看它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利于人民生活的改善，为改革扫除了思想上的障碍。十二大报告提出社会主义经济除计划经济外，还应当有市场调节，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十二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在计划与市场关系上迈进了一步，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取消了计划与市场谁主谁辅之分，并明确指出实行计划经济同运用价值规律、发展商品经济，不是互相排斥的，而是统一的，把它们对立起来是错误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决定和十三大报告都指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本质区别，在于所有制基础不同。十三大报告进一步提出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善于运用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这两种形式和手段。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也离不开市场的发育和完善，利用市场调节决不等于搞资本主义。计划和市场的作用范围都是覆盖全社会的。这样，就把对计划与市场关系的认识从旧观念中解放出来了。过去人们都把计划经济理解为苏联式的建立在产品经济基础上的计划管理体制，十三大报告则提出：必须把计划工作建立在商品交换和价值规律的基础上。我理解，这就是说要把计划工作从产品经济的基础上转移到商品经济的基础上来。既然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就必然有商品交换，也就必然有市场。商品与市场的关系是鱼和水的关系。现在对于商品经济是不是就是市场经济的问题，理论界还存有各种不同的看法。尽管如此，我国要进一步深化改革，就要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就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让价值规律发挥调节作用，这是毫无疑义的。《论竞争性市场体制》所探索的，正是这个问题。

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在于企业和劳动人民都成为国家的主人，都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可是我们过去的经济管理体制，使得企业只能吃国家的“大锅饭”，劳动者只能吃企业的“大锅饭”，却不能发挥自己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这种人工塑造的社会化大生产，不是由有生命力的细胞组成的生动活泼的有机体，而是由没有生命力的砖石堆砌成的不能自我生长的建筑物。现在我们的改革，从基本上讲，就是要打破“大锅饭”、“铁饭碗”制度，让竞争所引发的活力注入经济生活中来。一方面，我们的改革要有一个较为宽松的环境，用经济手段把宏观经济管理搞好。另一方面，我们应该理顺价格，平整市场，让各企业能够在同一个起跑线上公平竞争，使竞争方法规范化。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从没听说不靠竞争机制就能使经济繁荣、就能实现现代化的。敬璉同志所著《论竞争性市场体制》的关键含义，我个人认为就在这里。

4

当然，也正因为这样，敬璉同志的这本新著虽题为《论竞争性市场体制》，其实内容涉及到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各个方面。不过其中心思想及贯穿全书的主线，还是要建立适应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竞争性市场体制，这表明了他对社会主义经济改革方向的深刻认识。

对于敬璉同志这本书的某些学术观点，肯定会有不同意见，会发生争论。而争论是好事，不是坏事。不要因为害怕争论，而把自己的意见掩盖起来。争论过程本身就是对社会主义经济认识的进一步深化和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进一步完善。究竟谁是谁非，可以让实践作结论。我相信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希望实践能为他的这本学术著作修正错误、充实新的内容。

总之，在学术讨论中，应当鼓励人们独立思考，大胆地提出各自相同的和不同的观点。只有这样，我国的经济科学才能得到

繁荣，我国的经济建设和经济改革才能减少失误，避免曲折。我热切地希望有更多的经济学家能够写出更多无愧于我们伟大时代的著作来。

前 言

放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书，还是三年前我国经济学界热烈讨论“中期经济改革”的基本思路和实施方案的时候写成的。当时，国家体改委委托几位有代表性的经济学家牵头组成课题组，分别草拟1988~1995年的“中期改革规划”，工作正进入收尾的阶段，刘吉瑞君被国家体改委借调到北京来，参加预定在1988年6月召开的“中期改革方案讨论会”的准备工作。在北京的几个月中，他常到我这里来，讨论同这个方案有关的种种理论和实际问题。这样的谈话大约进行了一二十次。本书就是根据这些谈话的记录整理而成的。现在斗转星移，讨论的背景和热点都发生了变化。但是翻阅旧稿，觉得书中讨论的主要问题似乎并没有过时，因此仍然值得将它呈献给读者。

近两年来，对于一些经济学家主张的经济改革“市场取向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等等的批评，处于经济论坛的中心位置。这些批判文章的主要观点是：在前几年的改革过程中，出现了一种“过分推崇市场机制的危险倾向”，有人“甚至要求按照市场经济的原则改造社会主义经济”，建立“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而“市场经济就是取消公有制”；因此，当时那种论调的实质，乃是“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作为社会主义经济改革的模

式”，“改变社会主义制度，实行资本主义制度”。

本书虽然在不少地方谈到社会主义经济改革必然具有“市场取向”的性质，但往往只是作为存而不论的前提，而没有对它作集中的论述，因为既然经过多年争论之后，多数人达到了社会主义经济应是“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商品经济”的共识，经济改革要以“市场取向”，乃是不言自明的。但在变化了的情况下，看来就这个问题多说几句话还是必要的。

目前我国理论界关于计划与市场关系问题的讨论还在进行。我个人是同意新近有些报刊上发表的、从经济运行机制的角度分析这一问题的观点的。例如，《解放日报》今年3月2日的一篇署名文章指出：“解放思想决不是一劳永逸的。就以计划与市场的关系而言，有些同志总是习惯于把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认为在市场调节背后必然隐藏着资本主义的幽灵。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化，越来越多的同志开始懂得：计划和市场只是资源配置的两种手段和形式，而不是划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标志。资本主义有计划，社会主义有市场。这种科学认识的获得，正是我们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问题上又一次重大的思想解放。”^① 这里只从改革理论的角度补充几点：

第一，经济体制的基本功能，是通过一定的制度安排和运行规则设定，在社会范围内有效地配置资源；传统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决议所说的“僵化模式”）的主要弊病，正在于经常造成资源配置的低效率和误配置；据此，改革的根本任务，乃是以一种能够有效地配置资源的新经济体制取代旧体制。

第二，理论和实践都已证明，为了有效地配置社会资源，在

① 皇甫平：《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解放日报》1991年3月2日。

计划指令和市场交换这两种资源配置手段中，应当以市场机制作为基础，也就是说，要通过有宏观管理和计划指导的市场来配置社会资源；在我国，实行这种资源配置方式的经济体制，被称为“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第三，无论从辞源上说，还是从语义上说，所谓“市场经济”，都无非是从资源配置的角度对“商品经济”（列宁）或“货币经济”（马克思）的另一种称呼，所以，“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也就是“社会主义有调节的市场经济”。

第四，如果考虑到不受任何行政干预的“纯粹市场经济”是从来不存在的，现代市场经济无一例外地与一定方式和一定程度的宏观管理、计划调节（或称“行政指导”）共存，那么，把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叫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并不会引起“要实行完全的市场经济”的误解。

第五，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是不能同“国家直接经营企业”（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决定语）的公有制实现形式兼容的（正如斯大林正确地指出的那样，在这种情况下，国营企业生产的生产资料仅仅保持着商品的“外壳”而不再具有商品的属性）。但除了意识形态的成见之外，似乎并没有其他的理由足以使人相信，在不同的公有制实现形式（例如以公有制法人持股为主的股份有限公司）下，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也不能与公有制兼容；所以很难认为，“市场取向等于资本主义取向”是一个已经得到科学证明的诊断。

与此相联系的，是对于 1989 年东欧剧变的原因的分析。在有些同志看来，东欧社会主义政权的丧失，可以溯源于市场取向的经济改革，因为实行市场经济（无论是“自由市场经济”，还是“可调节的市场经济”）、否定计划经济（哪怕否定的只是“中央控制的计划经济”），必然导致经济秩序的混乱和资本主义的复辟。

这种论断是否符合实际？近几个月来我国专家对此作过深入的讨论。有关文献甚多，这里只引述一次高级研讨会的纪要，来看一看“若干有一定理论素养，又对国内外实际情况了解比较深入的专家学者和实际部门的领导干部”是怎样看待这个问题的（见《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91年第2期）。这些专家和领导干部对苏联和东欧各国情况作出的总的判断是：由于理论上和实践中的缺陷，这些国家虽然经历了短则几年、长则几十年的“改革”，到80年代末，各国的情况仍然是“市场极度不发育，管理体制僵化封闭”。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国家“在减少或取消指令性计划指标以后，由于缺少完整的市场机制，企业自主权和宏观间接调控二者都将落空。又正是因为经济工作没有搞好，才导致经济、社会、政治危机交织”。另一些国家在“完善计划”上下功夫，但是，正因为这些国家的市场极度不发育，没有市场环境，价值规律无从表现，所谓“计划要尊重价值规律”只不过是句口号，“计划没有起到优化资源配置的效果，反倒成了僵化经济的桎梏，是导致社会经济政治危机根源之一”。我认为，这种分析是实事求是、有理有据的。东欧剧变固然有复杂的外部因素，但不能否认，毛泽东所说“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①，在这里是适用的。正像列宁所指出的：“劳动生产率，归根到底是保证新社会制度胜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东西。”^②离开了资源的有效率的配置，侈谈“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是完全文不对题的。而离开了竞争性市场体制的建立，要想改善社会主义经济的效率状况，则无异于缘木求鱼。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77页。

② 《列宁选集》第4卷，第16页。

本书所记录的对谈，是环绕着如何建立适应于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竞争性市场体制这一主题进行的。它涉及许多复杂的问题。我们现在把自己千虑之一得发表出来，是希望引起有志于振兴中华的经济学者的讨论。由于情况的变化，本书根据两三年前的情况作出的某些论断已经过时，同时从现在的眼光看，书中认识肤浅、需要改善的地方所在多有，这是要请读者鉴谅的。

吴敬琏

1991年5月31日